

薛瑄著作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及影响

陈 媛 刘 畅

摘要 明初理学大家薛瑄的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薛文清公文集》等数种,对薛瑄所有著作在亚洲的刊印和传播进行系统整理和全面考察,是研究儒学在东亚传播的重要环节。薛瑄著作的版本种类之丰、刊印次数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反映了薛瑄思想在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薛瑄其他著作相比,蕴含了其理学思想精华的《读书》二录更受到中韩儒学家青睐。这说明与理学理论相比,后代的东亚儒学家更加追求理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关键词 薛瑄 《读书录》 朝鲜朝 东亚儒学

中图分类号 B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4)02-0113-12

作者:陈媛,女,1981年生,河北保定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韩国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韩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刘畅,男,1981年生,吉林四平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韩国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和韩国文化。济南 250100

一、引言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谥号文清)和曹端,向来被认为是明初积极继承和发扬朱子学的儒学家。《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端有《太极图说述解》,已著录,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曹月川集》)《明儒学案》则将薛瑄认定为河东之学的先驱,并认为河东之学“悃悃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①,具有“谨守规矩”之学风。

以《读书录》为中心的薛瑄的作品,被明清的儒学者以及朝鲜等亚洲儒学者们作为理解朱子学的窗口不断地阅读和使用。例如,退溪李滉(1501—1579)阅读了《读书录》之后曾赋诗曰“真知力践薛文清,录训条条当座右。最是令人发深省,不为枝叶不玄冥。”^②李滉弟子郑述(1543—1620)则高度评价薛瑄为“皇朝倡先道学,得斯文正脉,惟吾敬轩薛先生其人也”^③。

①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0页。

② [韩]李滉《国译退溪全集》十二《别集·韩士炯往天磨山读书,留一帖求拙迹,偶书所感寄赠》,首尔,退溪学研究院,2001年版,第293—294页。

③ [韩]郑述《书读书要语续选后》,《寒冈先生文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5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59页。

作为河东学派的创始人,目前学界对薛瑄的研究集中在对其学术倾向的探究上,尚缺乏对薛瑄作品的版本及传播情况的系统整理与研究。199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薛瑄全集》,其中李安纲在《薛文清公文集点校说明》中对薛瑄《文集》的版本进行了整理^①,不过此整理并不完备,有些版本被遗漏。许雪涛亦撰文探讨了薛瑄《读书录》的版本情况^②。本文将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查漏补缺,同时对薛瑄的《读书续录》、《理学粹言》等其他数种作品的编纂、刊行和流传进行全面考察,并进一步探讨薛瑄作品传入东亚其他国家的状况。主要以韩国为例,分析薛瑄著作在韩国朝鲜朝时期的编纂、刊行和流传的情况及特点,深入探究朱子学在东亚不断扩散的背景下,河东学派领袖薛瑄的著作在东亚朱子学发展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影响。

二、明清时期薛瑄著作的刊行及传播

薛瑄相关的著作有几种,其中刊行最多流传最广的薛瑄作品为《读书录》、《读书续录》(以下简称《读书》二录)和《文集》,后代重新整理编纂的作品有《河汾诗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薛文清公策问》、《理学粹言》等。另外,在明代和清代一直存在以《读书》二录为基础,以“要语”和“类编”的形式对其进行重新编辑、刊行的情况,这可以看做是对《读书录》的一种补充。以下将分别探讨薛瑄各种相关著作在明清时期的编纂、刊行等情况。

(一)《读书录》和《续录》

《读书》二录是薛瑄平日阅读之时,心中每有所开悟时的随笔记记录累积而成的读书笔记^③。《读书录》在薛瑄生前已经刊行^④,不过这一版本未流传于世,并且关于此版本的记录也尚未发现,所以刊行此版本的人、时间、地点均无从知晓。只有《薛瑄年谱》^⑤中44岁(1432年)条载“七年壬子,先生四十四岁。在辰。按先生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食墨,正风俗,奏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日夕精研理学,寤寐圣贤,手录《性理大全》,潜心玩诵,夜分乃罢。深冬盛寒,雪飘盈几,唔咿不辍,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灯记之,或通宵不寐,味而乐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积为《读书录》。”^⑥《性理大全》于1415年刊行之后便为东亚儒学家广泛阅读和使用,薛瑄更是积极地阅览,而《读书录》正是对《性理大全》的省察。依据《年谱》记载,可推测《读书录》最早完成于1432年。但《读书录》中未有相关记载,所以1432年也只能为笔者推测。薛瑄于《续录》篇首揭示依张载“不思则还塞”之教,集其20余年的读书笔记而成《读书录》。换言之,薛瑄20余年的读书积累便是《读书录》,而其在沅做监察御史时期便成为《读书录》完成的重要契机。

① 1994年,李安纲与晓鹏在《晋图学刊》第3期发表题为《薛文清公文集版本小考》论文,其内容与《薛文清公文集点校说明》相同。

② 许雪涛《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③ [明]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3页。“遂于读书心中有所开时,随即札记,有一条一二句者,有一条三五句者,有一条数十句者,积二十余年乃成一集,名曰‘读书录’。……今年又于读书时,日记所得者,积久复成一集,名曰‘读书续录’。”

④ [明]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下,第1494页。“《读书录》者,先师河东薛文清公手笔,前后二十四卷也。当先师著述时,中心有得,至忘寝食,随笔札记,未暇轮类,已板行于世矣。”

⑤ 依据《薛瑄年谱》跋文,此《年谱》的初本为薛瑄弟子张鼎所编,在万历丁未(1607)年由杨鹤重新校对刊行。本文所参考的版本为清康熙55年(1713)薛瑄后裔的再刊本。

⑥ [明]薛瑄《年谱》,《薛瑄全集》下,第1707页。

同样,《续录》的完成时间也不明确,只依据《年谱》71岁条所载:“(英宗天顺)三年己卯(1459),先生七十一岁在里。先生既返初服,玩心高明,研究天人之际,阐发性命之微,着为《读书续录》。”^①在《续录》篇首小序中他揭示道“近年又于读书时日记所得者,积久复成一集,名曰‘读书续录’。但有得即录,不觉重复者,多欲删去,而意谓既以备‘不思还塞’,则辞虽重复,亦可为屡省之助云。”^②由这两条记录可推测,《读书录》与《续录》的编写在薛瑄致仕期间不断进行,两录在未经整理的状态下,在薛瑄在世时已被刊行并流传开去。

薛瑄弟子阎禹锡(1426—1476)于1466年将《读书录》仿照《近思录》的结构,删去重复的内容,厘为24卷^③。纵观其后出现的版本,基本上均为22卷或23卷,含《读书录》10卷(或11卷),《续录》12卷。由此可推断阎禹锡所整理的《读书录》中包含了《续录》。也就是说,1466年阎禹锡整理了《读书录》和《续录》,并刊行于世。之后两录在明清时期不断被重刊,其刊行情况整理为表1。

表1 明清时期《读书录》《续录》版本^④

版本	刊行人	刊行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入	序	备考
成化本	阎禹锡	1466 成化二年	山东章丘	24 卷	阎禹锡	阎禹锡	去其重复,仿《近思录》,又称“洛阳本”
成弘本		1464—1504 间		11 卷			具体不详 残存 6 卷
正德本	郑维新	1520 正德庚辰	河东书院	《录》10 卷,无《续录》	郑维新	郑维新 许讚	
萧本 ^⑤	萧鸣凤	1523 嘉靖癸未		24 卷			仿《近思录》,与阎本同
石门本	张珩	1525 嘉靖乙酉	淮	二录共 23 卷		张珩 田赋	
沈维藩本	陈棐	1555 嘉靖乙卯	山西闻喜	《录》10 卷,《续录》12 卷		陈棐	书中有《重刊读书录公移》,郑维新的序及许讚的后续
赵贤本	赵贤	1574 万历乙亥	楚中	《录》5 册,无《续录》		孙应鳌 赵贤	湖广布政司刊,收录《刻读书录引》,《刻读书录牌》
青州本	赵贤	1579 万历己卯	山东青州	《读书全录》8 册,含《录》5 册《续录》3 册	庄文龙 王圻等	冀鍊 周思稷 王圻	收录《刻薛文清公读书全录公移》,《薛瑄画像》,《小像赞》,《薛文清公事实》

① [明]薛瑄《年谱》,《薛瑄全集》下,第1727页。

② [明]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下,第1283页。

③ [明]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序》,《薛瑄全集》下,第1494页。“先师歿之二年,愚反复读之,深有感焉。乃仿《近思录》分门别类,去其重复,厘为二十四卷。”

④ 表1系依据国内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馆藏资料,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奎章阁等各图书馆馆藏资料整理而成,同时参考了许雪涛之《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

⑤ 萧本、光绪本、成弘本依据《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同上)补入。

(续表)

版本	刊行人	刊行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人	序	备考
李涑本	李涑	1596 万历丙申	蜚英馆	《录》11卷,《续录》12卷	李一松 李涑等	李涑	参照了日本和刻本
河津本	侯鹤龄	1599 万历己亥	山西河津	《读书全录类编》,含《续录》	侯鹤龄	侯鹤龄, 赵用光, 万自约等	筛选《读书录》和《续录》的内容
正谊堂本	张伯行	1708 康熙戊子	榕城	二录共8卷2册	张伯行	张伯行	去其重复。参看中华书局1985年版
乾隆本	薛天章	1751 乾隆辛未	山西	《录》11卷,《续录》12卷	梁开宗 阎廷玠	侯锦云, 王安国, 孙嘉淦	
光绪本		1894 光绪甲午		11卷			清麓丛书

由表1可知,薛瑄去世后的数百年间,《读书录》和《续录》不断被刊行。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

第一,表1中的李涑本是笔者通过调查新发现的版本,在此将其补入^①。1991年山东友谊书社所刊《读书录》的《出版说明》中指出《读书录》有3种官刻本,即由赵王朱厚煜所刊的藩刻本,由侍御赵玉泉在福建所刻的闽刻本,鄢陵(今河南省内)陈棐编纂而由闻喜(今山西省内)沈维藩所刻的沈维藩本。但是经笔者调查官版还有赵贤本和青州本等。赵贤本是赵贤担任湖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时在湖广布政司刊印的官刻本^②。青州本为赵贤在山东为官时期将赵贤本(无《续录》)与从冀康川(人名)处得到的《续录》合刊的版本。此版后附《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公移》,因此可断定青州本亦为官刻本。

第二,1991年出版的《读书录》之《出版说明》中言及的3种官刻本,陈棐《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全录序》云“初以全录奉赵王枕易,王即刻之藩邸,继以全录贻侍御赵君玉泉,君即刻之闽省,今以全录复沈君维藩,沈君刻之闻喜。是予刻梓文清此遗书,有此三遇其人也。”^③即藩(陈棐序文中作“藩”)刻本、闽刻本、沈维藩本均为对陈棐《全录》的再刊本。而《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中提到一种十一卷的“赵府味经堂刻本”,刻于嘉靖丁巳(1557)。味经堂亦称居敬堂,是明代被封河南赵藩之简王朱高燧(1404—1431在位)所建,味经堂嘉靖间曾刻《薛文清读书录》十一卷^④。又据陈棐在《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全录序》所记,赵王枕易曾刻陈棐本《读书录》于藩邸,嘉靖间在位赵王为康王朱厚煜(1521—1560),朱厚煜则又称为“枕易道人”^⑤。换言之,赵府味经堂刻本即山东友谊书社所提及之藩刻本。

① 例如1991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的《读书录》为沈维藩本的影印本,其中收录了正德本郑维新和许讷的序文。换言之,1991年出版的《读书录》参考了正德本。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薛瑄全集》中提及了成化本、石门本、河津本和乾隆本等。另,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薛文清公读书录》是以正谊堂本为底本整理的。而《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中未提及李涑本,1975年台湾的中文出版社影印了享保七年(1721)在日本刊行的和刻本《读书录》与《续录》,此和刻本为李涑本的翻刻本。笔者在此补入。

② 赵贤本中有《刻读书录牌》。此牌文是古代官衙中使用的一种公文,这也说明赵贤本为官刊本。

③ [明]薛瑄《刻薛文清公读书全录序》,《读书录》,1991年版,第14—15页。此序文收录于沈维藩本中。

④ 何槐昌、沈雅君《明代藩府刻书》,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5年第3期。

⑤ 陈清慧《明代藩府刻书辑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李庆立《〈谢榛全集〉讹误举要》,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第三,关于河津本。迄今为止学者均认定河津本为《读书录》版本中的一种。山西人民出版社所刊《薛瑄全集》也引用侯鹤龄的《薛文清公读书录叙》,得出相同结论^①。但笔者在考察河津本原本^②之后发现此本不同于《读书录》的其他版本。首先,书名并非“读书录”,而是“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所谓“类编”,是侯鹤龄重新整理了《读书录》,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分类。其所作序文亦名“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总目”,其中写道“及再读,逐条号记分类抄集,窃以便览焉……内再删其重复。”^③此编共20卷82类,各类之上添加标题。如卷1—3中包含了“易”、“书”、“诗”、“春秋”和“礼记”。侯氏打破原《读书》二录结构,将两录内容合为一体,进行了重新分类整理,并删掉前后重复的部分,其内容远少于二录原文。因此,河津本并非《读书录》版本的一种,而是在二录基础上进行了再加工的一种变形版本,应另作一类。

(二)《读书录》的变形版本

如上文提到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将《读书录》原结构解体之后,依据编者的目的进行重新编纂的变形版本还有几种。其中流传最广的为吴廷举(1459—1525)^④编纂的《读书录要语》。此编抄录的是《读书录》中有助于改正吴氏自身习气的语句^⑤,即此书是为了其自身的学习和修养编纂的。此书内容不多,共1册,分上中下三卷。通过弘治辛酉年(1501)吴廷举于四川所作的序文可知此书大概成于1501年左右。《要语》出版后被多次再刊。正德十六年(1520)胡纘宗(1480—1560)对《要语》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用于安徽的学生学习^⑥。他认为“公读书录不止此,此特其吃紧者耳。要之为读书录也,其以要语名篇者,恐非公意,今正之”^⑦,因此他又将书名从“要语”重新改回“读书录”。嘉靖甲申年(1524)萧世贤(生卒不详)携胡纘宗所刊《读书录》入秀地,为教育当地学生重新刊刻了《读书录》^⑧。由此可断定秀地所刊版本与安徽所刊为同一版本。关于《读书录》变形版本整理为表2。

表2 《读书录》变形版本

书名	编辑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读书录要语	吴廷举	1501 弘治辛酉	四川	一册,上中下三卷	吴廷举	吴廷举	包含两录
	胡纘宗	1520 正德辛巳	安徽	同上	胡纘宗	胡纘宗 萧世贤	重新校对
	萧世贤	1524 嘉靖甲申	秀	同上		萧世贤	重刊胡本

① [明]薛瑄《薛瑄全集》下,第1497页。

② 现存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奎中4981.00)。

③ [明]侯鹤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总目》,载《薛文清公读书录类编》,河津本,第5—6页。

④ 吴廷举,字献臣,号东湖,本贯苍梧。历任四川成都府同知、广东按察僉事、江西右参政、广东布政使、右都御史。嘉靖三年(1524)退隐,著有《东湖集》等。

⑤ [明]吴廷举《读书录要语序》,载《薛文清公读书录要语》,永嘉本。“朱子而后立言为训者数十家,予窃爱近代薛文清先生读书录,因日读之,复抄其要语于册以备时习,……予为是,非敢僭有所取舍也,取其中吾习气之病者而攻之,为日用潜修地耳。”

⑥ [明]吴廷举《读书录要语序》,载《薛文清公读书录要语》。“纘宗守皖得萧君比部时砥砺焉,一日出示是录类分之,与纘宗所编本少异,因再与校勘,乃从纘宗本,刊之以示皖诸生,使知向往焉。”

⑦ [明]吴廷举《读书录要语序》,载《薛文清公读书录要语》,永嘉本。

⑧ [明]吴廷举《刻读书录跋》,载《薛文清公读书录要语》,永嘉本。“可泉胡子刻读书录于皖,世贤挟一册来秀,以示诸生。钱教谕文曰‘以胡子惠皖学者惠秀士何如?’曰‘吾志也。’于是文遂刻之学宫。刻成请序。”

(续表)

书名	编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薛文清公读书 全录类编	侯鹤龄	1599 万历己亥	山西河津	一册 20 卷 82 类	侯鹤龄	张崇儒 侯鹤龄等	称河津本
读书录抄	纪大奎	1816 嘉庆丙子		含二录,一册, 未分卷	纪大奎	纪大奎	抄录自己最 需要的部分
读读书录	汪双池	1895 光绪乙未		上下卷 2 册	卢葆辰 倪望重等	赵舒翘 展如甫	
薛子条贯	戴汝舟	1848 道光戊申		《条贯》13 卷, 《条贯续篇》13 卷		周玉麟, 戴汝舟等	依《近思 录》分类
	戴汝舟	1893 光绪癸巳	广州府署	同上		张曾扬	重刊

(三) 文集类

《文集》最早是由薛瑄弟子张鼎整理编纂的。由张鼎所作序文可知《读书》二录及《河汾诗集》在当时已广泛流传,唯独《文集》,初由薛瑄之孙祺托谢庭桂刊印未果,后薛瑄之同乡好友畅亨路经镇阳,张鼎便找到畅亨,从畅亨处得到《文集》并读之。发现其中误缪颇多,方知此非原本。于是他校对此本,并仿唐《昌黎集》将一千七百余篇厘为 24 卷。时为弘治己酉年(1489)^①。

对《文集》版本的研究已较为详尽,根据山西人民出版社《薛瑄全集》,《文集》的版本从大的方面可分为四种。即《诗集》、《文集》、《全集》和《全书》,这四种版本的大致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文集》系统(据山西人民出版社《薛瑄全集》整理)

书名	编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河汾诗集	薛祺	1469 成化己丑	常州	1130 首 8 卷	阎禹锡	阎禹锡 谢庭桂	
文集	弘治本 张鼎	1489 弘治乙酉	镇阳	1700 篇 24 卷	张鼎	张鼎	模仿《昌黎集》
文集	万历本 张鼎	1614 万历甲寅	真宁	24 卷		薛士弘	薛瑄 8 代孙重刊,含张鼎序
文集	雍正本 张鼎	1734 雍正甲寅	河东	24 卷		赵邦清 侯腹心	薛氏合族重刊,含张鼎序
全集	嘉隆本 赵氏	嘉靖隆庆间		《读书录》17 卷, 《文集》23 卷, 《附录》1 卷	邢台 赵氏		附《薛公神道碑铭》《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记》《名臣录》
全集	万历本 崔尔进	1615 万历乙卯	江南	《读书录》《文集》	崔尔进	崔尔进 董其昌	将李、吕、彭的文章置于《读书录》之首

^① [明]薛瑄《薛敬轩先生文集序》,《薛瑄全集》上,第 12 页。

(续表)

书名	编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全书 康熙本	张伯行	1708 康熙戊子	榕城	10 卷	张伯行	张伯行 蔡衍鏡	从《读书录》《文集》中选取
全书 雍正本	薛家族	1734 雍正甲寅	平原	《文集》《二录》 《名言》《粹言》 《年谱》等	薛氏 家族		含二十种文章和薛祺的 《蓼虫吟》等诗

由表 3 可以总结出《文集》刊行的两个特点: 第一,《文集》(含《全集》、《全书》中的《文集》部分)均以张鼎所编为底本。除康熙本外,其他版本的《文集》内容无甚差异。康熙本是从《文集》中选出了部分内容编纂而成。第二,与《读书录》和《要语》相比,《文集》多为薛瑄弟子和后裔主持刊行。如表 3 所示,嘉隆本、万历本、康熙本外,其他版本均为薛瑄弟子和后裔所刊。

经笔者调查,文集系统尚需补入另外一种版本。一种名为《敬轩先生文集》的版本中收录了李腾芳于弘治癸亥年(1503)所作的《重刊薛敬轩文集序》,序中写道“侍御李君虔夫以我朝文章大家如薛文清公《敬轩集》,虽尝梓行,而传之弗广,遂重刻于河东运司。”^①由序文可知李虔曾在薛瑄家乡河东重刊文集。此版本是李虔担任侍御时所刊,序文中提到的“运司”为古代官厅的一种,所以此版为官刻本,在此笔者称其为“李虔本”。

(四)《年谱》、《粹言》、《名言》、《策问》

薛瑄《年谱》共刊行过 4 次。依据《薛瑄全集》所载杨鹤的《年谱跋文》,最早《年谱》由薛瑄弟子张鼎整理完成^②,但完成于何时无明确记载。之后万历丁未年(1607)薛瑄的八代孙薛士弘携《年谱》给满汝阳,满汝阳又将《年谱》寄与杨鹤,并嘱其重新校对刊行。杨鹤则复将《年谱》托付给其子杨嗣校对并刊行。康熙癸巳年(1713)薛瑄第 11 代孙手抄《年谱》,经多次校勘后重新刊行了。后至雍正甲寅年(1734)薛瑄后裔刊印的《全书》中也收录了经过校对的《年谱》。

《理学粹言》正文之前载有薛瑄的一段话,其内容与《读书录》中薛瑄作的《序文》相同。不过《粹言》前后未附任何其他序文或跋文,所以无法判断此书是薛瑄亲手所作还是后人将薛瑄之言经过筛选编纂而成。《粹言》由薛瑄八代孙薛士弘于万历丙午年(1606)刊行^③,之后此书也收录在雍正甲寅年薛瑄后裔刊行的《全书》当中。

《从政名言》最早是胡缙宗在河南刊印《要语》后,又选取薛瑄关于政治的言论编纂而成,并于嘉靖十四年(1535)刊印发行。之后分别又于 1606 年、崇祯十六年(1643)、雍正甲寅年分别由薛瑄八代孙薛士弘、九代孙薛继岩和薛昌胤、薛瑄其他后裔刊行。

《薛文清公策问》由八代孙薛士弘于万历丙午年(1606)刊印,之后 11 代孙薛天章、薛天颜等再次刊印,但刊印具体时间不明。另外雍正甲寅年薛瑄后裔刊行的《全书》中也收录了《策问》。

(五) 版本刊行及传播的特征

以上是中国刊行薛瑄相关著作的情况,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把握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时间上来看,在薛瑄去世之后,经历了明清时期直到清末的 400 多年间,薛瑄相关的著作在

① [明]薛瑄《重刊薛敬轩文集序》载《敬轩先生文集》李虔本,第 185 页。

②③ [明]薛瑄《薛瑄全集》下,1990 年版,第 1734,1599 页。

不断地刊行和流传。从地点上来看,薛瑄的相关作品在山西、山东、安徽、河南、四川、楚中(今武汉地区)、江南一带、常州、广州等地广泛刊印和流传。从北到南,以及广大的东部地区,其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换言之,在跨越明清的长久历史时期,薛瑄的著作在广大的区域内不断被刊行和阅读,发挥着其强大影响力。这说明朱子学在明清时期不断在中国的士大夫中扩散,其中朱子学的一个内容便是由薛瑄所解释的朱子学。

第二,综合来看,目前所发现的所有版本,《读书》二录的刊行比薛瑄的其他作品要多。《读书》二录的版本有10余种,在二录的基础上变形的版本有5种,而《文集》共7种版本。《全书》和《全集》中均收录了《文集》和《读书》二录。其他的如《粹言》和《从政名言》等的刊行次数不过两三次。由此可知与薛瑄其他作品相比,后代儒家更重视《读书》二录。二录的内容完整地反映了薛瑄的理学思想,从这个层面来看,后代对薛瑄著作的阅读主要围绕薛瑄的理学思想展开。人们对作为政治家的薛瑄进行称颂的同时,更加关注作为理学家的薛瑄。

第三,《读书》二录的版本被广泛传播的同时,以二录为基础的变形版本也非常多。尤其是《要语》和《条贯》被多次重刊。变形的版本主要是删除二录中重复的部分,对其余内容进行重新分类,或者是编辑的人考虑自身修养选取二录中相应内容整理而成。这种再编是后代学者根据自身情况和意图,对薛瑄的理学思想展开阅读和学习的一种真实反映。

出现多样的变形形态,与《读书》二录的内容相联系,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中国朱子学的一个特征。与解释理学理论相比,《读书》二录的中心在于根据理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实践的生活方式。即,与理学学说本身相比,《读书》二录把重点放在实践工夫和修养上,书中收录的内容均可作为工夫实践的指南,这些内容是薛瑄自己通过工夫和修养获得的实际体认,所以后代学者们如果实践类似的生活或修养的话,《读书》二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二录经过各种形态的变形,作为日常的修养指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郑维新评价《读书》二录时说“其言近指远,其论事核而有中,教人约而有序,疗饥之菽粟,病之药石也。”^①《四库全书总目》则评价道“鼎自为序,引朱子赞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语为比,殆无愧词。”(《四库全书总目·薛文清集二十四卷提要》)前文所引退溪和黄宗羲的话与这两段引文异曲同工。总之,《读书》二录在整个明清时期在广大的范围内被阅读并引起深远影响,同时产生出多种多样的变形版本,促进了明清时期在日常生活中以实践为中心的朱子学的扩散。

第四,《读书》二录的再刊本中出现多种结构不同的变形版本,与此相比,《文集》则基本上一直以张鼎编辑的成文本为底本。不仅如此,《文集》和《粹言》、《名言》、《年谱》、《策问》等基本由薛瑄弟子或后裔刊行,这些著作“家刻本”或“门内刻本”的特点较为突出。而《读书录》能够依照《近思录》的结构进行再编,可见《读书录》引起后代士大夫广泛的响应和拥护。《文集》的重刊主要在薛瑄家门之内,突出体现的是后裔对先祖业绩的追慕和继承。

三、韩国朝鲜朝时期薛瑄著作的刊行及传播

和中国其他儒学著作一样,薛瑄的著作也传入朝鲜并广泛流传。据笔者调查,目前传入中国的韩国版本的薛瑄作品情况大致如表4—6所示。用阴影标示的部分为目前在韩国发现的中国版本,未作标示

^① [明]薛瑄《刊读书录序》,《读书录》,1991年版,第29页。

的是传入韩国但目前尚未发现的版本^①。

表4 《读书录》《续录》

版本	编辑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成化本	阎禹锡	1466 成化二年	山东章丘	《读书录》24 卷	阎禹锡	阎禹锡
正德本	郑维新	1520 正德庚辰	河东书院	《读书录》10 卷,无《续录》	郑维新	郑维新 许贇
石门本	张珩	1525 嘉靖乙酉	淮	二录 共 23 卷		张珩 田赋
沈维藩本	陈棐	1555 嘉靖乙卯	山西闻喜	《读书录》10 卷,《续录》12 卷		陈棐
赵贤本	赵贤	1574 万历乙亥	楚中	《读书录》5 册,无《续录》		孙应鳌 赵贤
青州本	赵贤	1579 万历己卯	山东青州	《读书全录》8 册,含《录》5 册,《续录》3 册	庄文龙 王圻等	冀鍊 王圻 周思稷
李涑本	李涑	1596 万历丙申	蜚英馆	《读书录》11 卷,《续录》12 卷	李一松 李涑等	李涑
河津本	侯鹤龄	1599 万历己亥	山西河津	《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含《续录》)	侯鹤龄	侯鹤龄,赵用光,万自约,赵讷,马负图
正谊堂本	张伯行	1708 康熙戊子	榕城	二录共 8 卷 2 册	张伯行	张伯行
乾隆本	薛天章	1751 乾隆辛未	山西	《读书录》11 卷,《续录》12 卷	梁开宗 阎廷玠	侯锦云 王安国 孙嘉淦

表5 《读书录》的变形版本

书名	编辑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读书录要语	吴廷举	1501 弘治辛酉	四川	一册 上中下三卷	吴廷举	吴廷举	包含两录
	胡缙宗	1520 正德辛巳	安徽	同上	胡缙宗	胡缙宗 萧世贤	重新校对
	萧世贤	1524 嘉靖甲申	秀	同上		萧世贤	重刊胡本
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	侯鹤龄	1599 万历己亥	山西河津	一册 20 卷 82 类	侯鹤龄	张崇儒 侯鹤龄等	称河津本

^① 本表格系根据对韩国国会图书馆、韩国国立图书馆、首尔大学图书馆、高丽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笔者直接进行了实地调查)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成均馆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韩国古典翻译院(这些均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调查) 等机关所收藏资料进行调查后整理而完成。

(续表)

书名	编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读书录抄	纪大奎	1816 嘉庆丙子		含二录,一册,未分卷	纪大奎	纪大奎	抄录自己最需要的部分
读读书录	汪双池	1895 光绪乙未		上下卷 2 册	卢葆辰 倪望重等	赵舒翹 展如甫	
薛子条贯	戴汝舟	1848 道光戊申		《条贯》13 卷, 《条贯续篇》13 卷		周玉麟, 戴汝周等	依《近思录》 分类
	戴汝舟	1893 光绪癸巳	广州府署	同上		张曾扬	重刊

表6 《文集》系统

书名	编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校对	序文作者	备考	
河汾诗集	薛祺	1469 成化己丑	常州	1130 首 8 卷	阎禹锡	阎禹锡 谢庭柱		
文集	弘治本	张鼎	1489 弘治乙酉	镇阳	1700 篇 24 卷	张鼎	张鼎	依据《昌黎集》编纂
	万历本	张鼎	1614 万历甲寅	真宁	24 卷		薛士弘	薛瑄之八代 孙重刊, 张鼎序
	雍正本	张鼎	1734 雍正甲寅	河东	24 卷		赵邦清 侯腹心	薛氏合族重刊 张鼎序
全集	嘉隆本	赵氏	嘉靖隆庆间		《读书录》17 卷,《文集》23 卷 附录 1 卷	邢台 赵氏		后附《薛公神道碑铭》,《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记》,《名臣录》
	万历本	崔尔进	1615 万历乙卯	江南	合《读书录》与 《文集》	崔尔进	崔尔进 董其昌	李,吕,彭之文置于《读书录》之首
全书	康熙本	张伯行	1708 康熙戊子	榕城	10 卷	张伯行	张伯行 蔡衍鍈	从《读书录》《文集》中选出
	雍正本	薛家族	1734 雍正甲寅	平原	《文集》《二录》 《名言》《粹言》 《年谱》等	薛氏 家族		包含二十种文章,并载薛祺的《蓼虫吟》等诗作

通过表 4、5、6 可以把握流传入朝鲜的薛瑄作品的几点特征: 第一,《读书》二录以及二录的变形版本基本上都传入了朝鲜,与二录相比《文集》的流入很少,说明朝鲜学者更重视饱含薛瑄思想的《读书》二录。第二,中国长期不断地刊行薛瑄作品,这些作品都陆续被引入了朝鲜。正如薛瑄思想在中国的扩散,他的思想在朝鲜也一直备受重视。

朝鲜的儒家们除引进中国版本外,还积极自行刊印薛瑄的著作。其刊印情况整理为表 7。

表7 朝鲜刊行的薛瑄著作

书名	编辑者	时间	刊行地点	结构	序文作者	备考
读书录	洪柱世	1656 永历丙申	湖西	《读书录》8卷,《续录》6卷	洪柱世(朝),郑维新,许讚,王圻	以正德本为底本
读书录 要语	郑述	1574 万历乙亥	川谷书院星州	上中下三卷	吴廷举,胡纘宗,萧世贤	1592年焚毁于壬辰倭乱
	郑述	1607 万历丁未	永嘉	上中下,《续选》四卷	吴廷举,胡纘宗,萧世贤,郑述(朝)	选取一些条目编为《续选》,称永嘉本。
	徐君			上中下,《续选》四卷	吴廷举,胡纘宗,萧世贤	在皖本后附《续选》
	黄宗海	1625 天启乙丑		上中下,《续选》四卷	吴廷举,胡纘宗,萧世贤,郑述(朝)	黄宗海手抄徐君版本
		1626 天启丙寅	罗州牧	上中下,《续选》四卷	吴廷举,胡纘宗,萧世贤,郑述(朝)	
	金世濂	1642 崇祯壬午	咸兴臬司	上中下,《续选》四卷	吴廷举,胡纘宗,萧世贤,郑述(朝)	郑述重刊永嘉本

关于薛瑄的《文集》朝鲜宣祖(1552—1608)时,金宇颙于1574年11月5日经筵时,曾评价薛瑄的学问为“甚亲切有益学者”、“践履笃实”经筵之后他阅览校书馆中所藏《文集》,请求宣祖刊印,得到允许^①。可以看出宣祖和朝鲜学者刊行薛瑄《文集》的原因在于薛瑄以实践为主的学风。不过此时刊行的《文集》版本笔者尚未发现,因此此次刊印是否得以实施还不明确。

朝鲜刊行的《读书录》版本,如表7所示,只有洪柱世刊印的唯一的一种。但有相关记录表明宣祖时期已经刊印过一次。1568年进贺使许晔从北京回到朝鲜后,进呈薛瑄的《读书录》,宣祖马上命令刊印此书^②。在《高峰集》的《论思录》中,有一条1569年6月的记录,载此时《读书录》“方印出”^③。由此可推测许晔进呈的《读书录》于此时刊出。虽然无法准确判断许晔从中国购入的《读书录》是何种版本,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可能是1555年所刊的沈维藩本。后1574年朝宪以质正官身份从明朝返回朝鲜,进

① [韩]金宇颙《经筵讲义》,《东冈先生文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5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第356页。“上见赵宪所上《质正录》言薛文清事,谓宇颙曰‘薛公《文集》,可刊行也。’对曰‘《文集》臣未及见,见其《读书录》,甚亲切有益学者。’上曰‘《文集》在本馆矣。’宇颙退而取阅,后于筵中,启请刊行,且曰‘有《行实录》一册,纪其行迹,践履笃实,真可为学者师,请附《文集》后刊行。’又曰‘《南轩文集》有益学者,请并刊出。’上皆从之。”

② [韩]许晔《行状》,《草堂先生文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36册,首尔,景仁文化社,第556页。“戊辰,充进贺,封太子副使,中朝学士,多敬服焉。及还,购薛文清《读书录》上之,命印颁。”

③ [韩]奇大升《高峰先生论思录》,《高峰集》,《韩国文集丛刊》第4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第199页。“吾儒学问中,朱之论甚是,而近来自中原流布之书不一。薛文清《读书录》亦其一也。今方印出,议论亦不能无疵,学者以为考见之资可也。”

呈了吕柟所作《薛文清祠堂记》,请求将此记附于《读书录》后一并刊行,宣祖命附此记于篇首,刊印发行^①。

从总体上来看,与中国相比,朝鲜所刊行的薛瑄的《文集》及《读书录》等著作相对较少,而中国所刊印的薛瑄著作基本上都传入朝鲜并广泛传播。由这一点可以看到,退溪和栗谷以后的朝鲜理学,以朱熹著作为代表的宋学著作为依据追求理论与实践,同时呈现出涵盖明代理学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从朝鲜朝理学家们对薛瑄及其理学思想的评价可以更明确地把握,鉴于篇幅问题,此问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详细探讨。

四、结 论

以上讨论了中国明清时期和韩国朝鲜朝时期薛瑄著作的编纂、刊行和传播的情况及特点,揭示了宋学以后以薛瑄著作为代表的朱子学在东亚传播扩散的状况及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薛瑄去世之后其作品在中国和朝鲜被不断刊行和阅读。其中《读书录》的李涑本和《文集》的李虔本是目前研究中未被提及的版本,经笔者调查这两种版本确为后代所刊,应归入薛瑄著作的版本系列中。同时,薛瑄的著作在中国及韩国不断被刊行和阅读,发挥着其强大的影响力。这说明朱子学在东亚的士大夫中不断扩散,其中的一个内容便是由薛瑄所解释的朱子学。

第二,《读书》二录及其变形版本的刊行比薛瑄其他作品要多。二录的内容完整地反映了薛瑄的理学思想,后代对薛瑄著作的阅读主要围绕薛瑄的理学思想展开。联系《读书》二录的内容,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中国朱子学的一个特征,即《读书》二录把重点放在工夫和修养上,是薛瑄自己通过工夫和修养获得的实际体认,与理学学说本身相比,后代学者更注重依据理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实践的生活方式。而《文集》的重刊则主要在薛瑄家门之内,突出体现的是后裔对先祖业绩的一种追慕和继承。

第三,《读书》二录及其变形版本基本上都传入了朝鲜,与二录相比《文集》的流入却很少。由此可以看到,退溪和栗谷以后的朝鲜理学,以朱熹著作为代表的宋学著作为依据,更加追求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① [韩]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重峰先生文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第186页。“臣窃观吕柟所记《薛文清祠堂记》,则其人学行之高,概可想矣。故臣敢具雁于后以进,如或前颁《读书录》之中未及载印,伏愿以此还下于校书,命印而颁之,使一时学者咸得观感,则以之从祀而人知景仰矣。○先生追注曰:是年月日,传于校书馆,印出《读书录》,再并令附印斯记于篇首。”